

## 轉型期社會階層重構的語言學再現

### ——以漢語泛尊稱的社會分層為例

◎ 李明潔

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就進入了一個有著國際標本意義的社會轉型期。這個時期，整個中國社會不論是政治意識、經濟形式，還是文化觀念和風俗形態都發生著史無前例的重大變革。社會階層的重新分化以至新階層和新的階層格局的形成都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中國和世界必須共同面臨的一個課題。

作為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者，我們直覺到社會生活各個層面上發生著的顯著而又微妙的變化，一定會在社會語言的使用中有所體現。若以社群方言為參照系，其變化應該是以社會變化而導致的階層分化為起因，以具有群體特徵的階層方言的形成及其使用為結果。也就是說轉型期社會階層的重新整合、變化即重構都將在社會語言使用的層面上得以再現。

那麼，如何來驗證我們的這個假設呢？

我們發現稱呼語是一個很適合這一論題的分析樣本。因為稱呼不僅是社會人際關係在語言中最系統、最直接的投射，而且還能折射出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因素，從中可以窺視一個社會人際關係的方方面面。至於社會樣本，我們則決定選擇轉型特徵最為明顯、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城市：上海。

### 一 社會階層與語言分析之間的關係

#### 1. 我們選擇泛尊稱作為語言分析的指標

我們首先需要說明社會階層與語言分析之間是相關的。

因為在我們的語言生活中，人們的社會階層直接影響著他們的語言選擇，從而形成了分屬於特定階層的「社會方言」中的「階層變體」。而通過對階層變體的研究又可以反過來印證、比對甚至構擬社會階層的格局。

我們選取泛尊稱作為語言指標，把對泛尊稱的態度(以下皆稱作態度值)作為衡量手段。這是因為泛尊稱是在最廣泛的場合下社會成員普遍使用的帶有一定敬意的稱呼語，它最能集中體現人們在特定社會時期的整體價值傾向和當下社會心態的變化。我們從初步的調查報告1中可以看到：由於人們性別、年齡、職業、收入和文化程度的不同，人們對各個泛尊稱的態度值也就不盡相同。這些變化著的態度值異常敏感地顯示出人們社會階層上的差異。通過

對調查結果的一般性統計，我們感到有可能也有必要對以下兩個觀點進行驗證，這就是：第一，對泛尊稱的態度值是上海市各種層次的話語中體現社會差別的標記；第二，社會階層的構成要素：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收入都對人們的態度值產生影響，且其影響呈某種趨勢。

## 2. 社會階層的確定標準

那麼，有沒有一個客觀的可操作的社會階層的分化方法呢？我們開始在西方經典理論中尋找答案。

「社會階層」這一概念首先是在西方政治學中出現並成熟的，而且也廣泛地輻射到西方其他人文學科。它根植於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它在其他學科的應用也無不受其影響。我們不妨來看一看「社會階層」概念在西方社會語言學中的應用實例。

### 二 用語言態度衡量社會分層的西方理論和方法

#### 1. 關於社會階層及其評估公式的西方經典論述

##### (i) 社會分層與社會階層

我們研究上海市泛尊稱的社會分布狀況，首先就面臨著貫穿在這個城市生活中的社會分層模式。這裏，我們採用貝爾納·巴柏（Barber）的定義：社會分層是社會分化和社會評價的結果（Barber 1957，1-3）<sup>2</sup>。使用這個術語不是指哪個特別類型的階級或等級，而只是表明社會的正常生活方式已經在一定的集團和人群之間形成了系統的差別。而且分層的形式已被公認為是地位和聲望懸殊的體現。而社會分層體現在個體與群體身上即為社會階層。

那麼，在社會分層中有哪些重要的指數呢？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語言學教授馮·戴伊克（van Dijk）指出：「關於群體的社會再現可能包含的節點有：面貌、來源、社會經濟目標、文化背景、性格等。這些範疇構造社會再現的命題內容。」<sup>3</sup>它們不僅體現共有的社會知識而且包含有評價信息，如對於其他群體成員的一般看法。

##### (ii) 社會階層的評估公式

有不少社會語言學家試圖概括上述諸多指標與個人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考察那些不可測量的但直觀上與概念相關的因素。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美國語言學家、社會語言學的開拓者之一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提出的公式：

社會階層分=職業×2+教育×4=收入×1+住房×1<sup>4</sup>

在這個公式中，拉波夫將收入劃為10級，教育劃為5級、住房劃為5級、職業劃為10級。他認為一個人所達到的教育水平比起收入來直感上與社會階層的劃分聯繫更大，教育與職業在決定社會階層時比收入、居住地區、住房都重要。不同的社會語言學家在社會階層構成的界定與要素的選擇時有一些差異，但可以看出他們一致認為：社會階層是社會分層的結果，而這些分層是由於職業、文化程度與收入等要素的差異而產生的，這就提示我們：可以把社會分層這一不易把握的現象通過可以調查的內容：職業、收入等來考察。功能主義的分層理論也

採取相似的方法，如美國就曾把一百多種職業按社會聲望的高低排出名次來。

## 2. 對於社會階層評估公式的置疑

雖然這些經典論斷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可行的思路，但同時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它們是否有一定的適應範圍？也就是說，這一基於政治制度的模式，是否適合我國的國情和實踐經驗？

比如，在我國，「秘書」的地位就很難說比「空姐」高<sup>5</sup>。再如，在上海，居住環境的差距與職業的差距之間不存在那麼普適的直接的關係，存在著除經濟之外的許多複雜的歷史和體制因素；其次，拉波夫階層公式中的各個系數也不一定適用於所有的語境；同時，將社會階層中的諸要素主觀地折算成一個終極分值可能會掩蓋許多社會事實。比如，在上海，以拉波夫的公式計算：一個收入很低的大學老師與一個文化程度很低但收入很高的個體商販在社會階層的分值上可能就是一樣的。上述兩種人並非個別情況，都不是特例，而是常態。但很顯然，其社會階層尤其是語言態度明顯地存在著差異。

## 三 尋找適合國情的社會分層指標

既然這些經典論述不一定適用於漢語的實際，那麼，在研究漢語的語言現象時，我們如何來把握人們社會階層的因素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以1034位上海成年人對各泛尊稱態度值的調查結果作為分析材料來尋找各社會要素與人們語言態度之間的規律。我們以態度值和社會階層為兩大變量，我們相信，一個人在其中一個變量上的屬性會導致他在另一變量上的某種屬性。

### 1. 理論依據

我們之所以要用語言態度來衡量社會分層基於我們以下的認識：

社會分層像社會共有的知識一樣，主要依靠話語在社會上再生。關於這一點，馮·戴伊克有明確的論述：「社會情景中的認知再現和認知過程有重要的話語平面。話語分析能成為有效的工具，揭示社會再現的深層內容、結構和策略」<sup>6</sup>。英國語言學家彼得·特魯杰（Pette Trudgill）也指出：語言現象以社會階層以及年齡等作為共變參數。而語言現象中的語言態度是我們通過調查可以得到的。

尤其是對泛尊稱的態度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因為泛尊稱較能體現全社會的主觀價值標準<sup>7</sup>。同時由於稱呼是交際主體在語言交往中處理與其他角色的關係，進行人際定位的一種語言活動，在體現對他人認識的同時，也附含著社會評價的因素。

### 2. 態度值的測量

我們是參照李凱爾特量表來測量人們對各泛尊稱的態度值的。<sup>8</sup>

通過問卷調查，我們很方便地得到了每個被調查者的態度值。經過簡單計算，我們也不難得到整個社會的整體態度值，這個整體態度值說明了全社會對各泛尊稱的接受程度。這是對全體被調查者的平均狀態而言的。依據初步的調查，我們不難推知這些態度值與人們的社會階

層之間存在著的緊密的關聯。

那麼，這種關聯究竟呈現甚麼狀態？即構成人們階層的要素對其態度值是否產生影響？態度值的差異是否又會造成社會分層的形成？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選用范相關分析法來對數據進行分析<sup>9</sup>。可得到如下的結論。

#### 四 泛尊稱態度值與社會階層的對應規律<sup>10</sup>

1. 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收入四指標可作為泛尊稱社會階層的分層依據，因為以它們為標準的社會分層與分層後的態度值之間存在著嚴格的對應關係。
  - (i) 在一定地區內考察泛尊稱狀況時，可用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收入作為社會分層的指標。
  - (ii) 對泛尊稱態度較為統一的代表群體分別是：51至65歲的中老年、公務員和一般職員、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月收入在1001至2000元間者。
2. 年齡、職業、文化程度和收入都對態度值產生影響，但影響程度有大小區別。
  - (i) 文化程度和職業對態度值的影響較大；
  - (ii) 收入和年齡對態度值的影響較小。
3. 就社會整體而言，各社會要素對人們泛尊稱態度的作用幾乎是均等的。
  - (i) 就90年代中期上海的情況而言，職業、文化程度、年齡和收入已分別成為人們生活的不同目標，對整個社會的語言態度起著平衡與中和的作用。
  - (ii) 若我們把收入、職業、文化程度和年齡各分為五級，我們可按以下公式計算人們在泛尊稱態度上體現出的社會階層，即階層分= $0.21 \times \text{收入} + 0.29 \times \text{文化程度} + 0.27 \times \text{職業} + 0.23 \times \text{年齡}$ 。

#### 五 社會階層的重構與語言的階層分化

將我們通過社會語言學調查分析得到的規律與中國社科院新近完成的並正式公開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相比較，就不難發現社會階層的重構與語言階層分化之間具有的同構關係。

##### 1. 理論分析方法的同構性

- (i) 階層的五分法與我們稱呼語調查的五分法一致

按新標準劃分的十個社會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人員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它們分屬五種社會地位等級：上層、中上、中中、中下、底層 等。

我們的稱呼語調查也將被調查者分為了五大類<sup>11</sup>，每個階層的代表人物與報告中所列的五大社會經濟等級的示例<sup>12</sup>基本吻合。而我們的調查先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調查三年多。這是因為任何社會變革都必然會在語言層面出現先兆。

(ii) 階層分化的依據與我們調查的選項一致

原來的階層分化是以政治身份、戶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報告提出的新的社會階層劃分標準，則依據各個階層對組織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佔有情況。

在此，我們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韋伯的社會學觀點。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經確立過社會階層劃分的三重標準，即財富、威望和權力。作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三個方面的標準，它們分別對應著實現自我生活機遇、生活方式和意志要求的可能性。

而我們的研究也基於韋伯的觀點，分別對應職業、收入和文化程度三項指標。又由於語言活動的特殊性而添加了年齡這一要求。

## 2. 現實表現形式的同構性

(i) 泛尊稱過渡性定型模式的形成與新的社會分層的初步完成一致

《報告》概括性地指出<sup>13</sup>：

從宏觀層面上看待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就會發現，階層結構的變化是中國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的最核心內容。在這二十多年中，中國經歷著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經歷著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這些轉變最直接地體現在中國社會階層的現代化變遷上。

這種變遷在社會語言層面上與之相對應的，就是泛尊稱的使用在二十年間出現過三次社會選擇模式：80年代初以「先生、小姐」在沿海的出場首先打破了意識領域在人際定位中「同志、師傅」一統天下的堅冰局面<sup>14</sup>；至90年代逐步遍及大江南北，至中期呈現出多元化的形態<sup>15</sup>，多於3/4的人開始放棄傳統的泛尊稱上的親緣化傾向；90年代末漸進式地完成了一種過渡式的定型模式<sup>16</sup>。即以「小姐、阿姨/阿婆」為首選，以「師傅、同志」為補充。

我們在1999年底的調查中發現了泛尊稱的過渡性定型模式。它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人們對泛尊稱的肯定與否定的態度較之九十年代中期要明朗得多，這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社會歸位」的初步完成。所謂社會歸位是指人們將某一個體歸入社會某一階層（即某個由多項社會特徵構成的集合體）的社會化認定過程。

社會語言學家蘭伯特（Lambert）曾經指出：「稱呼選擇的社會標準」是「社會集團之間的差別的靈敏指針，同時是社會變革的靈敏指針。」人們可以「透過稱呼系統去發現與屬於某種類型的稱呼系統相關聯的獨立的社會特徵」<sup>17</sup>。這種同構關係使得泛尊稱——這種體現社會整體價值判斷的稱呼語的選定過程自然也成為「社會歸位」的完成過程。

個人稱謂態度的明確化表明著自我社會歸位的心理完成；而群體意見的分歧縮小，正體現著公眾社會分層觀念趨向統一。

(ii) 轉型期社會分層的複雜性與泛尊稱定型的過渡性同步

中國社會在歷史背景、文化背景、資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國社會轉型及其社會分層相對複雜，一如李培林先生指出的那樣：「新舊兩種社會體制、秩序規範和機制的並存交替局面將會持續一個較長時期」，「人們的身份和角色處在一種變動的狀態中，從各個層面上

表現出一種『模糊性』，往往使個人和組織喪失對自身角色及其角色規範的認同」<sup>18</sup>。

體現在泛尊稱的使用上，雖然在突變若干年後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但同時也伴隨著矛盾的衝突：泛尊稱的個人選擇會出現游移和模糊的現象，社會整體的過渡性定型模式具有明顯的待發展性。比如，某些泛尊稱形式像「太太」還沒有被公眾接受，說明與之對應的階層尚未形成或不被公認；通用泛尊稱中還存在著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阿姨/阿婆」與「同志、師傅」；「同志、師傅」還能叫多久？；「阿姨/阿婆」與「小姐/太太」誰將取得最後的話語權？這些問題要獲得最終的答案都必須以階層的認同為前提。

（iii）關於中間階層的分析與泛尊稱代表群體的分析吻合

《報告》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中間階層」概念的提出。它認為，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主導階層應該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這和我們的結論二幾乎完全一致。

報告中所指的社會中間層不是某個階層的代稱，而是幾個具有相近或相似特徵特別是收入處於中等或接近中等以上水平的階層的合稱。其準確的界定是「指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靠工資和薪金謀生，具有獲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有一定的閒暇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的社會地位分層群體」。<sup>19</sup>

我們調查中所說的具有全社會代表意義的中堅階層（對泛尊稱態度較為統一的代表群體）即是報告中所謂的「中間階層」。在1996年我們曾定義過這麼一個虛擬的標準人，他應該是：公務員、大學文化程度、月收入在10001-20000元之間、55歲。這類人在社會中所起的代表作用也為我們的語言調查結果所證實<sup>20</sup>。具體而言，他們對泛尊稱的觀點和看法（這與對人的社會評價緊密相關）較為一致而且穩定，人員分布很集中，因而他們的態度體現著主流文化的傾向，在社會上起著主導作用。

## 六 以漢語實際為指標的社會階層分析的待發展性

我們如何來看待社會階層的重構與語言階層分化之間具有的這種同構關係？

1. 首先，拉氏所得公式所依據的社會藍本是一個發育成熟的社會體制，人們在選擇優勢背景項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說有較為一致的價值取向。而上海乃至中國都處於變革之中，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社會價值。因而需要依據具體問題分析各社會要素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要素與語言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我們的漢語泛尊稱與階層之間的對應公式只是在轉型期適用的。

另外，正是由於拉氏依循的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所以其社會各要素之間存在著某些必然的聯繫。比如高文化程度將意味著高收入、好職業、高級的住房等等。所以他可以將各要素綜合為一個階層分，這種做法在他是合理的。而在上海這種必然的聯繫也正在一定的範圍內逐步成熟。我們的公式是針對轉型期的、普適性的，而拉氏的結論在特定的範圍內也可以參照。

2. 我們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一個國家的國情總是處於發展之中的。尤其是中國社會正處於急劇的轉型過程中，社會階層結構還不盡合理、與現代化建設的進程還不相適應，其社會語言

的再現形式也沒有最終定型。因而，還時刻存在著對我們曾經否定過的結論重新評估的必要。比方說，我們在上述的調查中曾經否定過拉波夫的住房條件作為階層分化的指標的做法。但是，僅就上海而言，這種狀況正在發生變化。隨著房屋商品化的不斷普及，住房與社會階層的聯繫已經愈來愈密切了。所以，在不遠的將來，也許我們有必要再一次看待住房這一標準。

再比如，我們以職業、文化程度、收入和年齡作為語言分層的社會學指標，主要是想以綜合分的形式彌補轉型初期職業聲望序列與收入序列嚴重脫節的狀況<sup>21</sup>。但是，新時期社會階層結構變動出現了新的特徵：階層地位由不一致轉至基本一致，即收入較高的職業，它的權力、聲望也較高<sup>22</sup>。這樣至少「職業」在該公式中的權重就需要被重新考慮了。

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為經濟、意識和體制的調整提供了舞台，現實利益整合的直接結果便是社會階層的重構。人際交往成為這種變革的直接載體，而泛尊稱的社會選擇則是其中最外化、最真切的價值折射。

這裏的社會價值帶有明顯的經濟隱喻的意味。一如布爾迪厄指出的那樣：「語言的交流也是一種經濟上的交流，它建立在一個擁有某種語言資本的生產者和一個消費者（或一個市場）之間象徵性的力量對比關係之上，它可提供某中物質的或象徵性的利潤」<sup>23</sup>。法國社會語言學家卡爾韋對此的解說更為直白：「話語除了是一般的意思交際之外還是財富的徵象和權威的徵象，它們的表達就是為了被人評價和聽從，社會的結構就存在與話語之中。」<sup>24</sup>

由此可見，人們所處的社會階層極大地影響著他們對語言的感受。同時，人們的語言態度也顯現出社會階層上的差異。我們的調查分析也清楚地表明：轉型期社會階層的重構會以社會語言使用的形式再現出來，而且與語言層面的這種同構關係往往是在第一時間出現並且涉及每一個語言使用者的。因而，語言研究尤其是稱呼語的研究對社會轉型及階層分析而言是前哨性和風向標性的，因為，這是一個象徵意味的窗口。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社會階層在經濟改革中的整合；文化評價在思想與行為之間的權衡；價值觀念在各類標準之間的游移以及人際關係在傳統與現實之間的較量。

## 註釋

- 1 首次調研時間是從1995年10月至1996年5月。其分析報告題為《泛尊稱使用在社會轉型背景下的解釋——上海泛尊稱使用狀況的社會調查報告》。刊載於北京《語言文字應用》雜誌1996年第4期，頁79-83。
- 2 參見拉波夫（William Labov）：〈紐約市百貨公司的社會分層〉，載祝畹瑾編：《社會語言學譯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頁121。
- 3 馮·戴伊克（Teun Adrianus van Dijk）著、施旭等編譯：《社會·心理·話語》（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11。
- 4 參見佐伊基（Arnold M. Zwicky）著，劉明霞等譯：《社會語言學演講錄》（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89），頁101。
- 5 據波普諾（David Popenoe）著，李強等譯：《社會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頁245-246，「美國職業等級及聲望分布」表中「秘書」的階層分為46，「空姐」為36。
- 6 註3戴伊克，頁211。
- 7 參見李明潔：〈泛尊稱：時代過往的實證〉，《中文自學指導》（上海），1996年第5期，頁

- 8 克特·W·巴克 (Bake) 主編：《社會心理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6)，頁251。
- 9 有關范相關分析法和詳細數據分析參見李明潔：〈上海市泛尊稱使用的社會分層——試論社會階層之構成要素對人們泛尊稱態度的影響〉，《語言文字學刊(第一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頁234，注3；頁222-33。
- 10 李明潔：〈稱呼語的社會階層分析規則〉，《語文建設》，1997年第3期，頁25。
- 11 李明潔：〈泛尊稱使用在社會轉型背景下的解釋——上海泛尊稱使用狀況的社會調查報告〉，《語言文字應用》，1996年第4期，頁80，表一：「被調查者的社會階層分布」。
- 12 陸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9，圖一：「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圖」。
- 13 註12陸學藝，頁44。
- 14 李明潔：〈風雲變幻說「先生」〉，《咬文嚼字》，1998年2月，頁33。
- 15 李明潔：〈稱呼方式趨向多樣化〉，《解放日報》，「社會廣角」，1996年7月9日。
- 16 李明潔：〈泛尊稱在社會轉型期的過渡性定位〉，《語文論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 17 轉引自Susan M. Ervin-Tripp著，王菊泉譯：〈稱呼的社會語言學規則〉，《國外語言學》，1884年第4期，頁17。
- 18 轉引自袁方：《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8)，頁41-42。
- 19 註12陸學藝，頁252。
- 20 參見李明潔：〈上海市泛尊稱使用的社會分層——試論社會階層之構成要素對人們泛尊稱態度的影響〉，《語言文字學刊(第一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頁225-26。
- 21 李培林：〈再析新時期利益格局變動中的若干熱點問題〉，《社會學研究》，1995年第5期。
- 22 段若鵬等著：《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階層結構變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97。
- 23 轉引自卡爾韋 (Louis Jean Calvet)，曹德明譯：《社會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82。
- 24 註23卡爾韋，頁82。

李明潔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91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學士，1998年華東師範大學語言理論及應用專業碩士，2002年攻讀華東師範大學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博士。專業領域為：社會語言學、語言—認知—社會的交叉研究、母語教學和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等。